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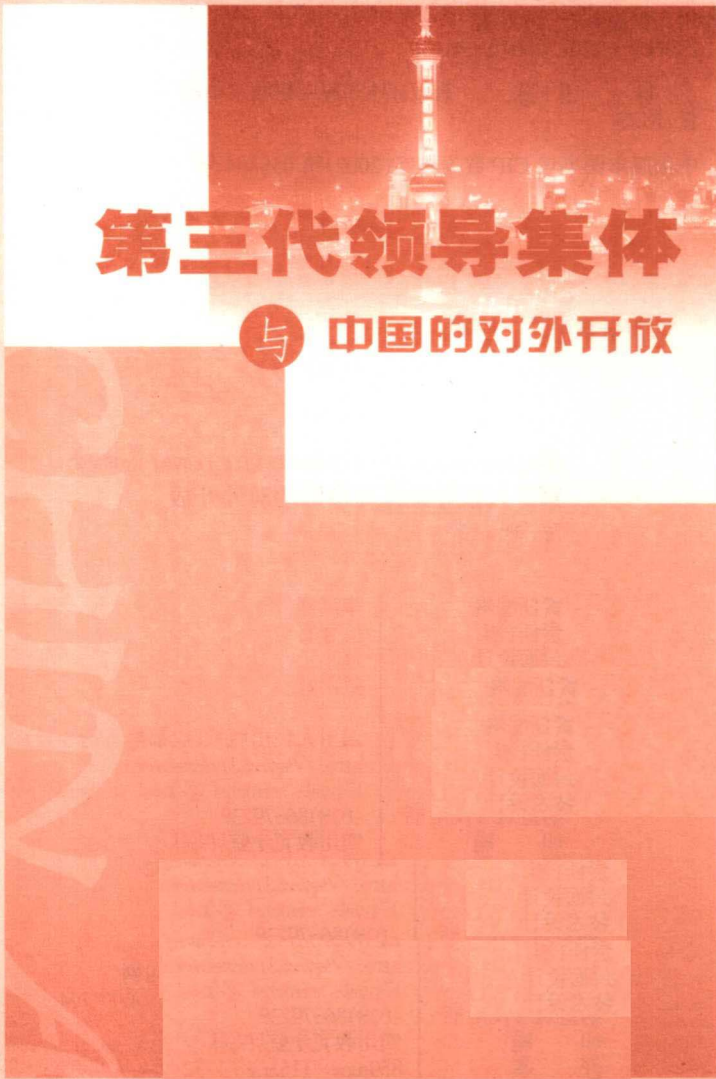


第三代领导集体 与中国的对外开放

陈 理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陈 理 著



第三代领导集体

与 中国的对外开放

四川人民出版社

前 言

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2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雄辩地证明，实行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国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完全可以这样说，改革开放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征。

改革开放，使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变化，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台阶。作为对外开放以来我国实现历史性变化和取得伟大成就的一个精彩缩影，深圳经济特区刚刚起步时，还只是一个人口不足三万、只点缀几座外贸仓库的边陲小镇，一些来创办“三来一补”企业的港商为了打一个国际长途还需要赶回香港去。20 年弹指一挥间，深圳经济特区已迅速崛起为一座具有 2000 多平方公里、人口 400 万的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全国的对外开放也由点及面，从沿海地区向广大内地梯次推进，开放的地域和领域不断扩大拓宽，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我国对外贸易从世界排名第 32 位，一举跃居全球十大贸易大国的行列，我国出口值已占到当年 GDP 的 20% 以上；从零

起步的利用外资，发展迅速，自1993年起已连续八年成为世界第二大引资国；通过加入世贸组织和实施“走出去”等发展战略，我国经济已大踏步地走上了世界经济舞台。

对于这些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变化，任何人只要不是刻意戴着有色眼镜，就难以回避和漠视。这些变化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于，它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正如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回顾这段历史时所指出的，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的意见，这是正常的。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随着实践的发展，一段时间里那种对开放的疑虑、抵触，包括把外资拥入视作洪水猛兽，甚至将对外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等等看法今天即使还有，相信也不会多了。但另一方面，能不能由此就倒推历史并责之前人为什么没有从一开始就实行对外开放呢？

这恐怕同样不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态度。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们是自己历史的创造者，但这种创造必须是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又强调，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来进行。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中指出，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

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不从它的特殊的歷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从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历史观点，对于如何研究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历史进程也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早在抗战初期，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的方针。他在六届扩大的第六次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从长期战争与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原则出发，组织一切可能的外援，是不可以忽视的。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起来。新的抗战形势中可能暂时地减少一部分外国的援助，加重了中国自力更生的意义，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但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我们不是关门主义者，中国早已不能闭关。

稍后，在为《论持久战》英译本所写的序言中，毛泽东又指出，在伟大的抗战中，基本的依靠中国自力抗敌。中国的力量也正在发动，不但将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且将压倒敌人而驱除之，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同时，需要外援的配合，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又十分明确地提出要积极与其他国家进行经贸方面的往来。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提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

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在50年代中期所作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毛泽东又专辟一节对中国和外国关系问题作了全面的总结和阐述。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我们不能不为之叹服，学习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包括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长处，这是何等宽阔的胸襟和恢弘的气魄！我们也很难说，当时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与苏联包括东欧等国家大规模的经贸和科技、文化往来。不属于对外开放。

当然，我们同时又不能不看到，当时诸多好的想法实际上并未能在实践中全部很好地实施。而且严格地说，当时对外开放的思想与实践，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作为基本国策的对外开放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首先源于特定历史条件的差异。

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邓小平不仅见证了这段历史，而且后来对此还作了很好的历史分析。在某种意义上说，新时期对外开放政策的提出，正是基于对此前有关经验教训深刻反思和总结的结果。

1978年9月，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指出，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比如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我们坚持反对帝国

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从邓小平这段分析中不难看出，此前之所以未能全面实行对外开放，既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

客观上，主要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出于称霸全球的战略目的，在其“扶蒋反共”政策失败后，仍然不肯放弃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从新中国一诞生起就对我实行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就经济方面的封锁而言，美国一直把经济手段视作对新中国施加压力的一个最有效的武器。新中国一成立，美国方面就完全禁止了对华出口贸易，继对输出中国的贸易一律实施全面许可证管制办法后，又冻结了中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并禁止美国注册的所有船只开往中国的港口。特别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之后，美国很快便操纵联大通过了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提案，要求各会员国在武器、弹药、战争用品、原子能材料、石油、具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以及对制造武器、弹药和战争用品有用的物资方面对中国进行“禁运”。专事贯彻对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禁运”战略物资的巴黎“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还专门设置了“中国委员会”，作为贯彻对中国“禁运”的机构，进一步加大对新中国的封锁禁运力度。这无疑极大地阻碍了新中国的对外开放，增加了新中国同国外进行经贸往来、恢复国民经济的困难。后来，中苏两国关系又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把中苏两党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扩大到了国家关系，单方面撕毁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有关协议，撤退专家，给中国建设

造成了严重困难和巨大损失。在两面夹攻之下的我国对外经贸事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主观上，则主要体现在50年代后期，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等。这些“左”的东西逐渐发展，并在后来暂时压倒了正确的方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在党内占据了上风，其极端表现便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四人帮”一伙从中推波助澜，大批什么“洋奴哲学”、“卖国主义”，进一步加剧了闭关自守倾向的发展。

尽管如此，这一阶段的探索与实践，毕竟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对外开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邓小平在指导《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当中，十分明确地指出，三中全会，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还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邓小平的这段论述，主要是就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说的，但对于对外开放，也同样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就大的方面来说，邓小平开创的对外开放事业较之前一阶段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是把此前已经提出，但限于客观条件没有能够进一步展开做起来的事情，根据新的历史条件进一步把它做好。比如，毛泽东提出的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要吸收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先进的东西，要与西方国家发展经贸往来等等

方面的重要思想，在新时期的对外开放中都得到了具体的全面实施。邓小平明确他说，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对外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要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这也是一个方面。国家关系即使不能正常化，但是可以交往，如做生意呀，搞技术合作呀，甚至于合资经营呀，技术改造呀，一百五十六个项目的技术改造，他们可以出力嘛。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

另一方面，是从反思和总结前一阶段的经验教训中，进一步提出新时期对外开放的一系列新的政策。恩格斯指出，伟大的阶级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学习中来得快。邓小平在会见尼日利亚民族代表团时，对恩格斯的这一观点作了很好的阐释和展开。他说，毛泽东主席过去讲过，犯错误有两重性，错误本身当然不好，给我们带来损失；另一方面，从错误中可以得到教育，改正错误，变聪明了，了解得更多了。在跟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谈“文化大革命”时，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的确，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把“左”的那一套东西发挥到了极致，也就不会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新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产生。邓小平一再明言，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产生，是基于对此前闭关锁国、自我封闭方面教训的深刻反思。1978年10月，邓小

平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指出，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作“崇洋媚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1987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又指出，鉴于过去的教训，必须改变闭关自守的状态，必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这样才制定了开放和改革的政策。

同样，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对外开放方面的理论与实践，也是根据当代中国的实际，对邓小平开创的对外开放事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结果。这种丰富发展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的产生是以实际的需要为基础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从我国对外开放事业进程来看，无论是邓小平开创的对外开放事业，还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外开放理论与实践的开拓与创新，无不是首先源于要正确回答对外开放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系列新的问题。如果把我国对外开放事业在20世纪的发展分为80年代和90年代前后两个阶段的话，我们党两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分别对各自所处时代提出的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特别是，进入90年代之后，面对着世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努力提高我国的对外开放水平已成为我国对外开放实践亟待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

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外开放本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

果。严格地说，我国对外开放包括“引进来”与“走出去”两个方面。但在对外开放开始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我们的基础相对较弱，我们只能以“引进来”为主。而经过2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的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实力有了明显增强，“走出去”的各方面条件已基本成熟时，我们就需要不失时机地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来发展自己。同样，我国对外开放是从沿海地区起步的，沿海地区利用自身的地理条件和政策优势先行一步的时候，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而当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对外开放就需要向内地、沿边地区推进，由“一个大局”先行进而“两个大局”同时并举。在对外开放在全国全面铺开时，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又面临着如何增创新优势，再上一个台阶的问题。

三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国内外复杂形势下驾驭对外开放全局的高超领导艺术。能否抓住机遇，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古人云，难得而易失者，时也；时至而不旋踵者，机也。故圣人顺时而动，智者因机而发。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对外开放之所以未能全面实行，其中固然有西方封锁等方面的原因，但也与我们没有及时充分利用国际已发生变化的条件有着相当的关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邓小平认为当时我们是自己孤立自己，自己把门关了起来。当70年代末、80年代初历史机遇又一次降临的时候，邓小平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敏锐眼光和雄才大略，紧紧抓住了这一机遇，在及时果断地作出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的同时，作出了实行对外开放的伟大决策。实践证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同样具有在国内外复杂形势下驾驭局势的能力。在90年代我国经济经过一段时间的力量积蓄，加快发展成

为其矛盾运动内在要求的时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确把握时机，顺势而上，及时果断地作出了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重要决策，把有利条件变成发展的优势。

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形成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全会的讲话中，江泽民郑重表示，我们党已经制定和形成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和一系列基本政策。概括地说，就是小平同志多次指出、最近再次强调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是我们有信心做好工作的根本的、坚实的基础。这次中央领导作了一些人事调整，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这段话，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一份庄严的政治宣言。

在实践中，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形成之初，就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定的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但细分起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开创的对外开放事业既有继承、坚持的一面，同时，更有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在总结此前对外开放经验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一面。具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把前一阶段已经提出并已经开展起来的课题进一步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比如，关于经济特区的发展问题。作为我国对外开放先行者的经济特区，经过10年的发展，已在我国

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扩大对外经济合作交流中，较好地发挥了重要的“窗口”和“基地”作用，并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许多方面先行一步，为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提供了重要的经验。经济特区 10 年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创办经济特区的实践是完全成功的，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进入 90 年代，在对外开放已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格局，特别是十四大作出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决策，沿边地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步伐大大加快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特区又面临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形势的发展，要求经济特区必须在过去 10 年成就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不停顿地把各方面的工作推向前进。1990 年 11 月，在庆祝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10 周年招待会的讲话中，江泽民明确提出必须把现有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五个经济特区进一步办好。1994 年 6 月，江泽民在视察广东时又进一步将经济特区今后的发展概括为“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十个字，并具体提出了五点要求：一是经济特区要为加快建立全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续积极探索和创造更多的经验；二是经济特区要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保持经济又快又好地向前发展；三是经济特区要继续发展外引内联，为带动和促进全国其他地区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作出新的贡献；四是经济特区尤其是深圳、珠海特区要继续为国家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和保持香港、澳门的长期繁荣，作出更多的贡献；五是要大力加强经济特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和改善党对特区工作的领导。这十个字和五点要求，无疑为经济特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又比如，关于外贸体制改革的问题。这方面的改革，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便已开始，并先后进行了赋予生产企业外贸经营

权、外贸代理制、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方面的改革。进入 90 年代之后，为适应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要求，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开始有意识地与国际通行的规则靠近和接轨，明确提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符合国际贸易规范的新型外贸体制的改革目标。通过取消补贴，自负盈亏，调整关税，改革配额和许可证管理制度，试行外贸登记制等一系列的重要改革，为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活动更好地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提供了体制上的有力支持。

第二，是将此前已经点题但还没有来得及展开的课题正式全面实施，并取得明显成效和阶段性成果。比如，洋浦的开发开放，是在 80 年代末期随着海南建省并成为全国最大经济特区之后提出来的，而正式作出开发开放洋浦的重大决策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十四大召开前夕完成的。同样，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未能列入当初建立经济特区的总体考虑之中。邓小平后来曾不无遗憾地多次表示，回过头来看，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是一个大失误。一再提出，上海要抓住 20 世纪的尾巴，要抓住最后一次机遇。并当面叮嘱第三代领导要多关心上海浦东的开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后不久，及时果断地把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作为 90 年代我国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部署提了出来并组织了切实有力的实施，明确提出要以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的新飞跃。此举不仅使上海这个老工业基地重新焕发了青春，而且对整个长江沿岸地区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的对外开放的发展，对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局都产生

了十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第三，是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和更加积极地走向世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所采取的一系列新的重大举措。比如，加入世贸组织，是党中央在全面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为加快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加入世贸组织有关工作，始终是在党中央直接指导下进行的。江泽民提出的三项原则，成为我国参与相关谈判的重要指导思想。党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作出了加快谈判进程的重要决策。以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我国对外开放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国将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如果说，此前我国的对外开放是有限的、带试验性质的，因而也是自主的，而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的对外开放则是接受了国际通行规则的一种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全新的对外开放。又比如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沉着应对，及时果断地采取扩大内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千方百计扩大出口等措施，有力地化解了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特别是通过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市场多元化战略等等，为我国的对外开放开辟了一块更加广阔的新的天地，不仅在当前一个时期，而且对我国对外开放今后的长远的发展，都将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对外开放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内容十分丰富。本书择其要者，分成十一个专题进行了初步的梳理。通过分析，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这就是，十多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程中，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都有诸

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开拓。这种创新和开拓，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作为上述开拓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有关对外开放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开拓与创新，也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有关论述的极大丰富和发展。因此，本书虽然主要集中对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对外开放方面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开拓进行梳理和勾勒，但考虑到历史发展的传承性，在叙述中有些地方作了必要的回顾和比照。希望通过这种回顾和比照，有助于更加全面地把握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对外开放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开拓和贡献。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个初衷，能否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还有待于各位专家和读者朋友的检验。

目 录

一、继往开来，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外开放理论与实践的起步

- (一) 总设计师的政治交代 (4)
- (二) “制裁”与反“制裁” (12)
- (三) 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执行对外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
..... (37)

二、抓住机遇，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 (一) 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阶段的标志
..... (59)
- (二) 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
..... (79)

三、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带动长江三角洲 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

- (一) “浦东开发晚了，但还来得及” (119)